

# 论明代诗话的发展与专门化

周维德

(浙江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, 浙江 杭州 310028)

[摘要] 明代诗话是在前代诗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,它对明诗的发展及清代诗话的形成起过积极的作用。明代诗话是中国诗话的发展期,在中国诗话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明代诗话的发展可分为初期、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:初期诗话以讲诗法为主;中期诗话主要是宣扬复古主义;后期诗话已成为专门之学,其中心议题是彻底批判复古思潮,宣扬个性解放。明人在宋、元诗话的基础上,把宋诗话的综合之学发展成为专门之学,他们还发扬元诗话偏重诗法的优点,把它充实提高,使之成为系统的诗学理论,创造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明诗话。明代诗话的时代特色主要表现在时代性、针对性、理论化、系统化及专门化五个方面。

[关键词] 明代诗话 前代诗话 形成与发展 时代特色

[中图分类号] I 207.22 [文献标志码] A [文章编号] 1008-942X(2003)05-0055-09

明代诗话在明代诗学理论批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,它对明诗的发展、清代诗话的形成起过积极作用。因此,研究明代诗话,对继承诗学理论遗产,发展诗学理论,促进诗歌创作,具有重要的意义。明代距今久远,诗话流传不广,且多孤本、善本,一般不易见到,给读者、研究者带来诸多不便。为方便读者,促进明代诗话的研究,我们编纂了一部《全明诗话》,收录明代诗话123部<sup>①</sup>。1991年10月,在桂林召开的“中国首届诗话词话研讨会”上,《全明诗话》得到公认和肯定。当时会上讨论的,还有吴文治先生主编的《明诗话全编》(1997年12月已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)。两书体例不同,吴编以人立目,除收录已单独成书的诗话外,广为蒐辑诸书中的论诗之语,拙编专门汇集完整的明人诗话集,按时代先后排列,不录摘编一类的著作。1992年,《全明诗话》被列入国务院古籍整理“八五”规划。现就编纂过程中对明代诗话的发生、发展以及特色等问题的认识与理解,提出讨论,以就正于方家。

## 一、明代诗话发展之由来

明人在宋元诗话的基础上,创作了具有时代特色的诗话。诗话虽不起源于宋,但“莫盛于宋”<sup>[1]</sup>是明人的普遍看法。至于宋诗话兴盛的原因,明人做过深入的研究,认为主要是宋人善于论诗,喜欢讨论诗歌创作方面的问题,此风一盛,促进了诗话的兴盛和发展。谢肇蕤说:“宋人不善诗而喜谈诗,诗话至三十余家。”<sup>[2]</sup>这种看法一直影响到清代。吴乔说:“唐人工于诗而诗话少,宋人不工诗而诗话多。”<sup>[3]</sup>(p.602)几乎成为一种定论。其实,善诗不善诗,工诗不工诗,对诗话创作的关系不是很大,何况宋人善诗者、工诗者大有人在。就以“诗话”命名书的创始者欧阳修来说,他既善

[收稿日期] 2002-08-21

[作者简介] 周维德(1933-)男,浙江绍兴人,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吴越信息研究所教授,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及中国诗话学研究。

<sup>①</sup> 该书将由齐鲁书社出版。由于字数所限,书稿不得不删去三十多部,现仅存九十二部,删去部分拟出补编。

诗又工诗,成就很大。

喜谈诗,采取“以资闲谈”的形式谈诗,评论诗歌、诗人、流派,以及记录诗人议论、遗闻逸事、考证等等,促进了诗话的兴盛发展。我国诗话起自钟嵘《诗品》,品第甲乙,溯源师承,其后作者辈出,而为例亦趋广泛。如皎然《诗式》,备陈格律,孟棨《本事诗》,旁采故实,欧阳修《六一诗话》,体兼说部,以资闲谈。论诗而取闲谈的方式,有话则长,无话则短,不拘一格,所撰遂夥。诗话至宋,成为“文章家之一体”<sup>[1]</sup>,形成一种体裁,为社会所公认,为人们所喜爱,众人为之,著作成林。

在宋诗话中,明人最感兴趣的是严羽的《沧浪诗话》。如杨成的《诗法》、黄省曾的《名家诗法》等书中,都辑录了《沧浪诗话》的内容。明代复古派的诗论,也多受严羽的影响。他们提倡“文必秦汉,诗必盛唐”,就是继承严羽推崇汉、魏、盛唐的文学主张,他们的“格调说”,也是从严羽的“妙悟说”脱化出来的,从格调方面学习古人。高衡关于唐诗初盛中晚的分期,即是“观沧浪严先生之辨”,分唐诗诸体而得启迪的<sup>[4]</sup>(p.14)。李东阳在《麓堂诗话》中也祖述严羽的论诗主张,加以推崇。王世贞的《艺苑卮言》也多处称引严羽的论诗主张,阐述严羽的诗说。谢榛在《四溟诗话》中强调“超悟”、“兴趣”,也是严羽妙悟说的发挥。这一切都说明了严羽的《沧浪诗话》对明代诗话创作的巨大影响。

再说元代诗话对明诗话的影响。元、明两代,时代接近,影响更直接,何况明初的不少作者又是从元朝到明朝的,他们带来了元代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的影响。如郝经、戴表元、刘将孙等人的文学复古主张,发展成为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思潮,杨士宏《唐音》的“正音、余响”,发展成为高衡《唐诗品汇》正始正宗、大家名家、羽翼接武、正变余响。杨维桢的“性情说”,发展成为公安派的“性灵说”。

明诗话的形成和发展,除了受宋元诗话的影响外,还有其他原因,如文人结社兴起的影响。谢章铤《课余续录》说:“明人重声气,喜结文社。”<sup>[5]</sup>(p.522)据不完全统计,明代文人集团有一百七十六个之多,其中绝大多数是诗人集团,即诗社。他们以文会友,谈诗论文,促进了诗歌的发展,也促进了诗话的发展。明代许多诗话的作者便是诗社社员。如《唐诗品汇》的作者高衡是闽中十子诗社社员,《谈艺录》的作者徐祯卿和《艺苑卮言》的作者王世贞是七子诗社社员,《解颐新语》的作者皇甫汈和《玉笥诗谈》的作者朱孟震是青溪诗社社员,《小草斋诗话》的作者谢肇蘼和《蜀中诗话》的作者曹学佺是阆风楼诗社社员,等等。他们与当代名流,联吟结社,摘其章句和论诗之语入诗话,或汇编成诗话专著,名曰某某诗话。

## 二、明代诗话发展的几个阶段

明诗话是中国诗话的发展期,上承宋、元,下启清季,在中国诗话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明代诗话本身也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,如以时期划分,则可分为初期、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:即自洪武至成化(1368—1487)为初期;弘治至隆庆(1488—1572)为中期;万历至崇祯(1573—1644)为后期。这一分期,主要是根据诗话内容,同时参考文学史的分期而定的。明初诗话以讲诗法为主,同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有关。明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,建立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,采取高压政策和八股取士以限制知识分子的思想。文人被禁锢于八股之中,其说多本前人,少独立见解。

谈诗法是宋、元诗话的主要内容之一。明承宋元之旨,他们把宋元诗话中论述诗歌创作的理论汇编成册,供明人学习,促进明代诗歌创作的发展。如朱权的《西江诗法》虽分列25类,但内容主要是辑录杨载《诗法家数》和揭傒斯《诗宗正法眼藏》。杨成的《诗法》辑录杨载《诗法家数》、范盩《木天禁语》等著作。释怀悦的《诗法源流》也辑录了《诗法家数》中的言论。此外,他们还辑录《沧浪诗话》、《金针集》、《沙中金集》等著作中论诗法的内容。辑录这些著作的目的,是为了给初学者提供学诗的方法,推动诗歌创作。某氏《重刊诗法后序》说:“范德机秘旨之通确,严沧浪体制之要妙,杨仲弘《家数》之广蓄,《金针集》之意格纯正,《沙中金集》之字眼响健,《一指》、《普说》之论辨精博,反覆

沉潜,朝夕不厌。每抚卷叹曰:‘学诗之法,莫备于此。’〔6〕

明初诗话,亦有阐述己见、发明前人之说者,如黄子肃的《诗法》、解缙的《诗法》、吴纳的《诗辨》之类。周叙的《诗学梯航》不限于诗法,还论述了诗歌之源流、诗格之变化、诗体之发展,并品评了自魏至唐百数十人的作品。朱冀培的《松石轩诗评》则完全是品评作家作品之作,评述自汉魏至金元的作家近二百人。瞿佑的《归田诗话》亦品评唐、宋、元、明各代之诗,但详于述事,略于评说。

明自弘治以后,封建经济已经恢复到相当高的水平,社会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。此时“商贾多”,商品经济迅速发展,市民阶层开始壮大。“复杂多样而又酝酿着变化的社会生活刺激了人们的头脑,沉闷了多年的意识形态至此活跃起来。哲学上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。文学上首先活跃起来的是一批有朝气、有抱负的正统封建文人,他们立志以汉文唐诗为榜样,振兴正统封建文学。这就是明中叶的文学复古思潮。〔7〕p.49)这股思潮来势很猛,波及面很广,风靡百余年。明代中期的诗话主要反映了这股宣传拟古主义的复古思潮。

诗宗盛唐,推尊李杜,提倡“浑雅正大”的时代格调,是复古思潮的主要内容之一。李东阳的《麓堂诗话》取法唐诗,主于法度音调,当时奉以为宗。从法度音调学习唐诗是可以的,问题是学习法度音调如不与内容相联系,势必会导致形式上的摹拟,李东阳取法唐诗的毛病也在于此。尽管他也说过“泥于法而为之,则撑拄对待,四方八角,无圆活生动之意”的话〔8〕p.1376),但客观上却起了引导人们走上模拟唐人法度音调的作用,给后来拟古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。王世贞说:“长沙(指李东阳)之于何(景明)、李(梦阳)也,其陈涉之启汉高乎?”〔9〕p.1044)由此可见,他对前七子复古理论的影响。“弘治时,宰相李东阳主文柄,天下翕然宗之。梦阳独讥其萎弱,倡言文必秦汉,诗必盛唐,非是者弗道。〔10〕p.7348)操觚谈艺之士,翕然宗之。〔11〕p.7307)由此,正式形成了一个以理论作指导的拟古主义派别。

诗宗盛唐,推尊李杜,主于法度音调,重于体制气象方面的诗话,有徐祯卿的《谈艺录》、徐献忠的《唐诗品》、谢榛的《四溟诗话》、王世贞的《艺苑卮言》和《全唐诗说》等著作。当时还出现了像汪彪《全相万家诗法》一类专供模拟的课儿读物。这些诗话对复古思潮的发展,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前面我们已经说过,明诗话受宋元诗话影响最深的,首推严羽的《沧浪诗话》。但到了明代中叶,人们对严羽的创作理论不像初期那样盲目崇拜了,而是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对待它。都穆论诗主严羽妙悟之说,视为“的论”,但对严羽鄙薄宋诗之论表示不满,认为是“陋哉见也”〔12〕p.1344)。游潜论诗以严羽为宗,主张妙悟,但对宋诗的看法,与严羽迥别。他认为宋诗不及唐诗是事实,但不能由此就说“唐有诗,宋元无诗”〔13〕。这说明当时作者的思想已与初期不同,他们的思想已处于活跃状态,不再拘泥于前人之说,而是富有独创性。

这时还涌现了一批品评作家作品的诗话,如评历代之作的,有陈沂的《拘虚诗谈》、俞允文的《名贤诗评》;评一代之作的,有徐献忠的《唐诗品》、王世贞的《全唐诗说》;评当代之作的,有徐泰的《诗谈》、顾起纶的《国雅品》、王世贞的《明诗评》和《国朝诗评》;评一家之作的,有蒋冕的《琼台诗话》。其品类之多,是前代所没有的。特别是品评当代作家作品的专著之多,可说是空前绝后。如《诗谈》品评175人,《国雅品》品评247人,《明诗评》品评118人,《国朝诗评》品评108人。重视当代作家作品,及时总结经验,目的是为了推动当代创作。

在研究当代作家作品的基础上,他们还探讨了明诗的创作和发展问题。明诗不能走台阁体的道路几乎已成定论。但取法盛唐,仿效李杜,学习音节格调,模仿句字,一股声势浩大的复古思潮已统治整个文坛。于是,走复古老路还是走独创新路,成为摆在诗人面前的一个严肃问题。围绕着这个问题,展开了一场历时百年的论战。

即便在复古思潮盛行的时期,对明诗走什么道路的问题,也进行了讨论。当时有不少作家回顾了明诗的发展,从而总结经验,展望未来。陈沂说:“国初诗,沿于元之旧习。永乐以后,平淡近俚。

成化间始变,至弘治间稍盛,正德间数家有可传者。后多宗初唐,用富丽堆积,始百家衣,毕竟到头无经纬也。〔14〕杨慎说:“洪武初,高季迪、袁可潜一变元风,首开大雅,卓乎冠矣。永乐之末至成化之初,则微乎貂矣。弘治间,文明中天,古学焕日:艺苑则李怀麓、张沧州为赤帜,而和之者多失于流易;山林则陈白沙、庄定山称白眉,而识者皆以为傍门。至李、何二子一出,变而学杜,壮乎伟矣。然正变云扰而剽袭雷同,比兴渐微而《风》、《骚》稍远。嘉靖初,稍稍厌弃,更为六朝之调。初唐之体,蔚乎盛矣,而纤艳不逞,阐缓无当,作非神解,传同耳食。〔15〕(p.774)他们指出,“国初诗,有‘沿于元之旧习’者,有‘一变元风’者,变则诗盛。永乐至成化,台阁体风靡一时,至弘治变而学杜,古学焕日,变而诗盛。后之追随者,句字模拟,剽窃雷同,比兴渐微,又走进创作雷同的死胡同。所以走复古的老路,不是明诗发展的方向。

明自万历以后,左派王学横行天下,动摇了朱熹学派在中国长期的统治地位。在进步学术思想影响下,文坛上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文学解放思潮,与文学复古思潮相抗衡。明代后期的诗话创作在文学解放思潮的推动下,彻底批判文学复古思潮,反对拟古主义,宣扬个性解放,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。

明诗话发展到这个阶段,已形成自己的风格,理论色彩大大加强。首先,他们总结前代和当代的诗学理论,用以指导创作,批判文学复古思潮。这类诗话有胡应麟的《诗薮》、许学夷的《诗源辨体》、胡震亨的《唐音癸签》、冯复京的《说诗补遗》、钟惺与谭元春的《诗府灵蛇》、陆时雍的《诗镜总论》、费经虞的《雅伦》等。许学夷论诗,古诗宗汉魏,律诗法盛唐,对七子之作推崇备至。其论体着眼于变,论诗又主独创,与七子之论迥异。冯复京的《说诗补遗》是针对七子复古之论而发的,他从辨体辨格入手,批判七子诗有定格及句模字拟的论调。胡震亨的《唐音癸签》对唐诗进行了全面总结,是其研究唐诗的心得结晶,足供研究者参考。他虽没有直接批判七子复古模拟之论,但从“一人有一人本色”、“诗人各自写一性情,各自成一品局”的观点看,实际上是批判了七子之论。钟惺、谭元春的《诗府灵蛇》是针对七子、公安二派末流之弊而发的。他们求古人真诗、真精神,以避免重蹈七子模拟汉、魏、盛唐为学古及公安以鄙俚轻率为趋新的流弊。陆时雍的《诗镜总论》受钟、谭诗论之影响,求古人之真诗。但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,又与钟、谭之论不同。他对七子诗宗盛唐提出异议,认为唐诗精微,但不及古诗雄浑。费经虞《雅伦》是明代诗话之集大成者,他全面系统地总结古今诗学理论,探本求源,分门别类,理论兼及作品,自成体系。其论诗虽远宗严羽之论,近法王世贞之说,但不为严、王所囿。他主张诗文创新,反对拟古不化。上述诸家通过对历代诗论的考察、研究与总结,认为诗歌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发展变化的,一代有一代之诗,一人有一人之作,不必法某代,宗某人,只要表达真情实感,便是好的作品。

彻底批判复古思潮,反对拟古主义,宣扬个性解放,是这一时期诗话的中心议题。如李贽的《骚坛千金诀》、王世懋的《艺圃摘余》、焦竑的《焦氏诗评》、屠隆的《长卿诗话》、谢肇淛的《小草斋诗话》、叶秉敬的《敬君诗话》、穀斋主人的《独鉴录》等,都涉及了这方面的问题。李贽是明代后期文学解放思潮的中坚人物,提倡童心,反对以孔孟之道为主体的封建意识,追求个性解放。他认为文学应该写童心,表达真情实感,这样的作品才是真文学,否则就是假文学。他又从文学发展的观点出发,提出“诗何必古《选》,文何必秦汉”的主张〔16〕,否定了前后七子“文必秦汉,诗必盛唐”的复古理论。他在《骚坛千金诀》“十戒”、“十贵”中,提出“七戒乎蹈袭”、“三贵乎出尘”的主张,反对模拟,主张独创。焦竑是李贽的好友,提倡性灵说,反对近代诗人“第以剽略相高”的风气〔17〕。谢肇淛则指名道姓地批判七子“太模仿”、“得形似”的恶习。他说:“献吉继之,几于活剥少陵。高处自不可掩,而效颦之过,亦时令人呕哕。〔2〕叶秉敬说:“凡作诗者,绳墨必宗前人,意辞要当独创。若全依样画葫芦,便如村儿描字帖,恶足言诗也。〔18〕对复古思潮进行了彻底的批判。

即使是复古思潮营垒内部的人,由于受时代进步思想的影响,自知其非,反戈一击,批判复古思



潮,反对拟古主义。末五子中的王世懋和屠隆,论诗虽本七子之说,但对七子之流“争事剽窃,纷纷刻鹄”的拟古主义深表不满[19](p.778)。屠隆对复古主义的批判更激烈、更彻底。他说:“我明之诗,则不患其不雅,而患其太袭;不患其无辞采,而患其鲜自得也。”[20]“独观其一,则古色苍然,总而读之,则千篇一律也。”[21]这些言论,如匕首投枪,直刺七子,戳穿了他们欺人的本质。像这样锋芒毕露地批判复古主义,是前所未有的。从复古思潮营垒中批判复古思潮,更有说服力,其影响也更大。这表明文学复古思潮被文学解放思潮所代替,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,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。

在文学解放思潮的冲击下,不少文人突破正统封建思想和正统文学观念的束缚,到民间寻找真诗,以丰富自己的创作。同时对诗歌的艺术性,如构思、意境、风格、修饰等问题,在诗话中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,使明诗从“活剥少陵”、“千篇一律”的桎梏中解放出来,走上与民歌相结合的新生道路。

### 三、明代诗话的时代特色

明人在宋元诗话的基础上加以发展提高,并通过分析研究,把宋诗话的综合之学分门别类,成为专门之学,发扬元诗话偏重诗法的优点,予以充实提高,成为系统的诗学理论,创造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明诗话。明诗话的时代特色,主要表现在时代性、针对性、理论化、系统化、专门化五个方面。

(一)时代性。一代有一代之诗、一代之诗论、一代之诗话。着眼于当代,是明诗话的显著特点。朱权说:“诗不在古而在今,非今不能以明古之意。”[22]明初诗话主要是辑录前代诗话,为当代创作服务,其内容则偏重于诗歌创作方法和优秀作品的品评,为当代作者提供“学诗之法”[6]。

时代性是贯串明诗话的一条主线,主要表现在品评当代作家作品,兼及明诗发展诸问题,如李东阳《麓堂诗话》、陈沂《拘虚诗谈》、陆深《俨山诗话》,对明初的诗歌创作进行了分析品评。有的诗话还撰专卷记述或评论明人明诗,如何良俊《元朗诗话》卷三述录与时人交游的情况和作品,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卷五品评“国朝前辈名家”的艺术风格,郭子章《豫章诗话》卷六记述明代豫章诗人和宦游豫章诗人之题咏。有的则是专门论述明代诗人诗作的诗话,如徐泰《诗谈》、顾起纶《国雅品》、王世贞《明诗评》、胡应麟《少室山房诗评》等。

明代作家十分关心当代的创作与争论,及时地总结经验,写成诗话,以推动明诗的发展。顾起纶的《国雅品》总结了自洪武至隆庆二百年间的诗歌创作经验。王世贞的《明诗评》总结了明代118位诗人的创作经验,并分析评价他们的创作特色、艺术风格以及成就。周子文的《艺苑谈宗》汇编当代宗匠名家的诗论20种,“结集创作经验,以备时需”,作为当代“述者之指南”[23]。以诗话形式品评当代作家作品,总结经验,是明诗话的创体。

(二)针对性。所谓针对性,指创作的目的性比较明确。宋人创作诗话虽有目的,但不明确,主要是“以资闲谈”,所以创作不甚严肃,态度比较轻松。明人则不然,他们写作诗话都有一定的目的性,或为创作,或为复古,或为纠谬,所以创作的态度一般都比较严肃。当然,明人诗话中亦有“以资闲谈”的,但这类诗话不多。

诗话为创作者,则偏重于诗法,为学诗者提供一定的创作方法。《诗学梯航》的作者周叙说:“登山以求玉,必赖乎梯;涉海以探珠,必资乎航。”[24]“写诗如登山求玉,涉海探珠,而诗话如梯航,为作者提供创作方法,使之登山得玉,涉海获珠,入创作之门。王畿撰《诗法指南》,就是为了使初学者有法可依,有规可循;“作者之门,庶可入矣。”[25]又如黄子肃的《诗法》,讲的就是立意、造句、遣字三方面的内容,没有一句“以资闲谈”的话。这类诗话,还有王用章的《诗法源流》、黄省曾的《名家诗法》、梁桥的《冰川诗式》、茅一相的《欣赏诗法》等等。

诗话为复古者,为复古思潮服务。明代的复古思潮起源于宋元。宋自严羽提出“以盛唐为法”以后[26](p.688),元人步其后尘,转向唐音,如杨士宏撰有《唐音》专著,学习唐诗。明初,承严、杨之

说,力宗盛唐,倾向复古,开一代风气。文坛的复古思潮,在诗话领域中也有充分反映。当时不少文人往往通过诗话这一文艺随笔的形式,宣传其复古主张。如高衡撰《唐诗品汇》,主张以盛唐为法,李杜为宗,为前后七子诗宗盛唐开了先河。又如徐献忠撰《唐诗品》,品评有唐一代之诗,推尊盛唐。前七子李、何虽没有撰述诗话专著,但他们宣扬复古理论,往往通过书信往来的形式,而这种书信实际上也是一种诗话。后七子王世贞撰有《艺苑卮言》,谢榛撰有《四溟诗话》,宣扬复古。《艺苑卮言》提倡古诗尊汉魏,近体法盛唐,《四溟诗话》主张师法初、盛唐,而以盛唐为主。其他宣传复古、标榜七子的诗话则更多。

诗话为纠谬者,纠正诗学理论中的错误倾向。如安盘的《颐山诗话》、焦竑的《焦氏诗评》、屠隆的《长卿诗话》、谢肇淩的《小草斋诗话》等,对七子模拟剽略,活剥少陵的复古主义理论进行批驳,纠正其错误。冯复京针对“凡今之人,守琅琊之《卮言》,尊新宁之《品汇》,习北海之《诗纪》,信济南之《删选》,谓子美没而天下无诗”的错误理论<sup>[27]</sup>,著《说诗补遗》,予以匡正。钟惺、谭元春撰《诗府灵蛇》,以幽深孤峭反对七子以模拟汉魏盛唐为复古、公安派以鄙俚轻率为趋新的流弊。在批判错误理论,匡救时弊的同时,也有一些人站在复古派的立场上进行反批评,力挽颓波。如许学夷针对公安派和竟陵派的理论,撰述《诗源辨体》。他说:“近袁氏、钟氏出,欲背古师心,诡诞相尚,于道为离。予《辨体》之作也,实有所惩云。”<sup>[28]</sup>

以上事实表明,明人撰述诗话都有其一定的目的性、针对性,不是针对这一理论,便是针对那一理论;不是为这一理论服务,便是为那一理论服务。其争论的焦点是复古与反复古。争论虽很激烈,但都以理服人,不像宋人以“叫噪怒张”乃至“骂詈”对人<sup>[26]</sup>(p. 688),遂使争论引向深入,促进了诗学理论的发展。

(三)理论化。“诗话,文章家之一体”<sup>[1]</sup>,是一种文艺随笔性的体裁,有话则长,长至千言万语;无话则短,短到几字几句,写作比较自由,不拘一格。但必须围绕“诗”字展开,若离“诗”而谈,则成笔记矣。因其围绕“诗”字展开,即使闲谈,也不离诗事,故曰诗话。

谈诗,是诗话的中心议题。诗话盛于宋,和当时喜谈诗的风气有关。谈诗的风气刚形成时,可以是“以资闲谈”为主,但随着这种文体的发展,闲谈的内容也逐渐发生变化,由“论诗及事”向“论诗及辞”发展<sup>[29]</sup>(p. 156),论诗的成分渐渐增加,向单一的诗学理论方向发展。郭绍虞先生说:“我觉得北宋诗话,还可说是‘以资闲谈’为主,但至末期,如叶梦得《石林诗话》已有偏重理论的倾向。到了南宋,这种倾向尤为明显,如张戒的《岁寒堂诗话》、姜夔的《白石道人诗说》和严羽的《沧浪诗话》等,都是论述他个人的诗学见解,以论辞为主而不是论事为主。从这一方向发展,所以到了明代,如徐祯卿的《谈艺录》、王世贞的《艺苑卮言》、胡应麟的《诗薮》等,就不是‘以资闲谈’的小品,而成为论文谈艺的严肃著作了。”<sup>[30]</sup>(p. 3)

明人对诗话的看法和要求与宋人不同。许学夷说:“宋人诗话种种,不能殚述,然率多记事,间杂他议论,无益诗道。”<sup>[31]</sup>明人认为“诗话又以论诗”<sup>[32]</sup>,不是“以资闲谈”;若“以资闲谈”,则无益于诗道,对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的发展,都没有好处。这表明明人撰述诗话完全是为创作服务的,为明诗的发展和建立新的诗学理论服务的。他们努力提高诗话创作水平,向理论化的方向迈进。明诗话的理论化,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:

1. 创作态度。宋人诗话“以资闲谈”为主,明人诗话以论诗为主,要求不同,创作态度也就不同。诗话“以资闲谈”,想什么写什么,讲什么记什么,今天写一条,明天记一条,积累多了,自然成书,创作比较轻松。欧阳修“诗话之作,盖退居以后整理旧稿之所为也。《杂书》一卷,即《诗话》之前身已。是书以《杂书》为前身,故撰述宗旨初非严正。《宋四库阙书目》列入小说一类,盖非无因”<sup>[33]</sup>(pp. 2-3)。诗话论诗偏重于理论批评,临文结构都需深思熟虑,使之理论有特色,行文有条理,创作比较严肃。如许学夷撰《诗源辨体》,初稿本16卷,定稿本36卷,前后花了40年时间。他说:“是书

起于万历癸巳,迄壬子,凡二十年稍成。后二十年,修饰者十之五,增益者十之三。诸家之诗,既先以体分,而又各以调相附,详其音切,正其讹谬,而予之精力,实尽于此。〔28〕又如冯复京撰《说诗补遗》,也是花了一生的精力。他说:“《说诗》一书,虽有遗憾,然一生目力,尽在是矣。〔27〕如此严肃认真地撰写诗话,真可谓空前绝后,但在明代并不是个别现象。

2. 著作数量。宋诗话现存42种,辑佚36种,共78种。明诗话《四库全书·诗文评》著录37种,《明史·艺文志》著录38种,《中国丛书总录》著录57种,以上三种书目除去同名者外,共98种。《全明诗话》收录123种,远远超过了现存的宋诗话。根据《全明诗话》收录的情况来看,以资闲谈的诗话不过七八种,其余百来种诗话均为论诗评诗之作,有很高的理论价值。

3. 自成体系。理论化的主要标志之一,在于不仅理论性强,而且自成体系,按一定的形式排比编辑。宋人诗话虽亦谈论诗法,但比较分散,往往是在闲谈中流露自己的诗学观点,不成体系。当然,宋人也有如《沧浪诗话》一类的著作,不但理论性强,而且自成体系,但这样的诗话极少。明人重视诗话的理论性,多从理论的角度撰写诗话,并按一定的形式加以排比结构,编辑成书。如黄子肃的《诗法》篇幅虽短,却自成体系。他从立意、造句、遣字三个方面论述诗法;周叙的《诗学梯航》分叙诗、辨格、命题、述作、品藻、通论六类;皇甫汈的《解颐新语》,分叙论、述事、考证、论藻、矜赏、遗误、讥评、杂纪八门;梁桥的《冰川诗式》,分定体、炼句、贞韵、审声、研几、综颐六门。又如王世贞的《艺苑卮言》、许学夷的《诗源辨体》、冯复京的《说诗补遗》,除总论外,都是以时代先后为序,排比论述。此外,胡应麟的《诗薮》、胡震亨的《唐音癸签》,也有其严密的理论体系。即使是选辑前人的诗学理论,也按一定的体系入录。如朱权的《西江诗法》,分诗体源流、诗法源流、诗家模范等25类;李贽的《骚坛千金诀》,分诗学正源、诗准绳、诗口诀、唐人句法、宋朝警句、风骚句法七类。

(四)系统化。宋人视诗话为论诗之绪余,乃至成为以资闲谈的作品。明人重视诗话,诗话以论诗,常发表精辟独特的见解,使诗话向系统化方向发展。明诗话的系统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。

1. 诗话著作的系统化。诗宗盛唐,学习唐诗,是贯穿明代诗学理论的一条红线。明初,闽派诗人林鸿提出“开元、天宝间声律大备,学者当以是为楷式”〔34〕〔p. 7336〕,强调在格律声调上学习唐诗。林鸿的追随者高衢撰《唐诗品汇》,推尊李杜,定盛唐为唐诗正宗。茶陵诗派领袖李东阳撰《麓堂诗话》,主张取法唐诗,从音节、格调、用字学习唐诗。前后七子提倡“诗必盛唐”,把学习唐诗推向极端:“模辞拟法,拘而不化。独观其一,则古色苍然;总而读之,则千篇一律也。〔21〕”其后公安派、竟陵派虽反对前后七子剽窃模拟的习气,但并不反对学习唐诗。这条红线也贯穿着诗话创作,出现了系列化的著作。南溪的《南溪诗话》推崇李杜,开明代诗宗盛唐的风气。此后出现了一系列反映这方面内容的诗话,如陈沂的《拘虚诗谈》、王世懋的《艺圃撷余》、胡应麟的《诗薮》、蒋一葵的《诗评》、赵士喆的《石室诗谈》等。自高衢撰《唐诗品汇》后,又出现了一系列同类性质的诗话,如徐献忠的《唐诗品》、王世贞的《全唐诗说》、郝敬的《批选唐诗》等。诗宗盛唐,学习唐诗,也成了明诗话的主要内容,并在诗话中有了系统的反映、阐述和发明。这在前代诗话创作中是没有的。

2. 诗话理论的系统化。理论的系统化,主要是指理论研究的系统化。明诗话研究的诗学理论比前代全面而系统,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的研究内容。如明代初期的诗话以研究诗法为主,辑录或撰述的诗话也往往以诗法命名,如朱权的《西江诗法》、杨成的《诗法》、黄子肃的《诗法》等。明代中期的诗话以研究复古理论、宣扬拟古主义为主,如王文禄的《诗的》、汪彪的《全相万家诗法》、王世贞的《艺苑卮言》等。明代后期的诗话以批判复古思潮、总结诗学理论为主,如冯复京的《说诗补遗》、胡震亨的《唐音癸签》、陆时雍的《诗镜总论》、费经虞的《雅论》等。此外,对创作中的性情、性灵、情景、构思、风格诸问题,也作了系统的阐述和研究。

3. 诗话体系的系统化。明人撰述诗话,往往以纲带目,纲目分明。不论是辑录性的诗话,或是述作性的诗话,都有自己的体系。如朱权的《西江诗法》、皇甫汈的《解颐新语》、梁桥的《冰川诗式》、



李贽的《骚坛千金诀》、许学夷的《诗源辨体》、冯复京的《说诗补遗》等,或以文体分,或以内容分,或以时代分,分门别类,自成体系。

(五)专门化。中国诗话发展到明代,“以资闲谈”的内容逐渐减少,论诗评诗的成分不断增长,趋向纯理论,成为专门名家之学。如果说宋元诗话是文艺随笔性的著作,那么,明代的诗话已从文艺随笔过渡到文艺专论。作者撰述诗话,各执一端,深入研究,旁征博引,抒发己见。诗话有特色、有个性、有深度。

阐述创作理论的诗话,如周叙的《诗学梯航》,从辨格、命题、述作、品藻等几方面加以论述。徐祯卿的《谈艺录》,专论汉魏古诗,兼及情词气格。邵邦经的《艺苑玄机》,论诗之教、诗之体、诗之才、诗之思、诗之格,等等,内容十分广泛。此外,如游潜的《梦蕉诗话》、谢榛的《四溟诗话》、王文禄的《诗的》、王世贞的《艺苑卮言》、王世懋的《艺圃撷余》、田艺蘅的《香宇诗谈》、胡应麟的《诗薮》、谢肇淛的《小草斋诗话》、陆时雍的《诗镜总论》等,从不同的角度论述命题、构思、述作、语言、风格诸问题。论述创作方法的诗话,有黄子肃的《诗法》、释怀悦的《诗家一指》、黄省曾的《名家诗法》、王畿的《诗法指南》等。

明诗话不仅理论趋向专门化,批评也趋向专门化。如评历代作家作品的诗话,有朱冀培的《松石轩诗评》、俞允文的《名贤诗评》、许学夷的《诗源辨体》等;评一代作家作品的诗话,有高衡的《唐诗品汇》、徐献忠的《唐诗品》、王世贞的《全唐诗说》、郝敬的《批选唐诗》等;评当代作家作品的诗话,有徐泰的《诗谈》、顾起纶的《国雅品》、王世贞的《明诗评》等;评一家作品的诗话,有蒋冕的《琼台诗话》、朱谏的《李诗辨疑》、杨慎的《闲书杜律》、顾起经的《王右丞诗画评》等。

明季诗社盛行,而诗话的作者又往往是诗社社员,所以在诗话中有记述诗社社事者。如朱孟震的《玉笥诗谈》记录了青溪诗社社事。此外,还有诗格诗式一类的诗话,如梁桥的《冰川诗式》、某氏的《诗文要式》;又有诗体一类的诗话,如吴纳的《诗辨》、徐师曾的《诗体明辨》、陈懋仁的《诗体缘起》、杨良弼的《作诗体要》等;地方性的诗话,如郭子章的《豫章诗话》、曹学佺的《蜀中诗话》等;专论妇女作品的诗话,有江盈科的《闺秀诗评》等。

明诗话专门化的程度如此之高之广,是前代所没有的,即使与清代诗话相比,也不逊色。

## [参 考 文 献]

- [1] 陆深. 蓉塘诗话跋[A]. 姜南. 蓉塘诗话[M]. 明嘉靖二十六年洪梗刻本.
- [2] 谢肇淛. 小草斋诗话·卷二[M]. 上海图书馆馆藏明天启四年刻本. 清抄本.
- [3] 吴乔. 围炉诗话·卷五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《清诗话续编》本, 1983.
- [4] 高衡. 唐诗品汇凡例[A]. 高衡. 唐诗品汇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2.
- [5] 郭绍虞. 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·上编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3.
- [6] 某氏. 重刊诗法后序[A]. 杨成. 诗法[M]. 明正德十一年刻本.
- [7] 成复旺. 蔡钟翔, 黄保真, 等. 中国文学理论史·第3册[M]. 北京: 北京出版社, 1987.
- [8] 李东阳. 麓堂诗话[A]. 丁福保. 历代诗话续编本[Z]. 北京: 中华书局排印本, 1983.
- [9] 王世贞. 艺苑卮言·卷六[A]. 丁福保. 历代诗话续编本[Z]. 北京: 中华书局排印本, 1983.
- [10] 张玉书, 王鸿绪, 张廷玉, 等. 明史·文苑传·李梦阳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校点本, 1974.
- [11] 张玉书, 王鸿绪, 张廷玉, 等. 明史·文苑传序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4.
- [12] 都穆. 南濠诗话[A]. 丁福保. 历代诗话续编本[Z]. 北京: 中华书局排印本, 1983.
- [13] 游潜. 梦蕉诗话[M]. 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《学海类编》刊刻本.
- [14] 陈沂. 拘虚诗谈[M]. 民国25年四明张约园《四明丛书》刊刻本.
- [15] 杨慎. 升庵诗话·卷七[A]. 丁福保. 历代诗话续编本[Z]. 北京: 中华书局排印本, 1983.
- [16] 李贽. 李氏焚书·童心说·卷三[M]. 明万历刻本.



[ 17 ] 焦竑.澹园续集·文坛列俎序·卷二[ M ].明万历三十四年刻本.  
[ 18 ] 叶秉敬.敬君诗话[ M ].清顺治三年宛委山堂《说郛》续卷刊刻本.  
[ 19 ] 王世懋.艺圃撷余[ A ].何文焕.历代诗话[ Z ].北京 :中华书局排印本 ,1981.  
[ 20 ] 屠隆.鸿苞节录·论诗文·卷六[ M ].清咸丰七年保砚斋刻本.  
[ 21 ] 屠隆.由拳集·文论·卷二三[ M ].明秀水朱仁刻本.  
[ 22 ] 朱权.西江诗法自序·西江诗法[ M ].明嘉靖十一年重刊本.  
[ 23 ] 周子文.艺薮谈宗序·艺薮读宗[ M ].明万历二十五年序刻本.  
[ 24 ] 周叙.诗学梯航序[ A ].周叙.诗学梯航[ M ].天一阁馆藏明成化刻本.  
[ 25 ] 王畿.诗法指南引[ A ].王畿.诗法指南[ M ].明万历二十七年蕴古堂刻本.  
[ 26 ] 严羽.沧浪诗话·诗辨[ M ].北京 :中华书局《历代诗话》排印本 ,1981.  
[ 27 ] 冯舒.说诗补遗跋[ A ].冯复京.说诗补遗[ M ].上海 :复旦大学图书馆馆藏抄本.  
[ 28 ] 许学夷.诗源辩体自序[ A ].许学夷.诗源辩体[ M ].明崇祯十五年陈所学刻本.  
[ 29 ] 章学诚.文史通义·诗话[ M ].北京 :中华书局排印本 ,1956.  
[ 30 ] 郭绍虞.清诗话前言[ A ].丁福保.清诗话[ M ].上海 :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,1978.  
[ 31 ] 许学夷.诗源辩体·卷三五[ M ].明崇祯十五年陈所学刻本.  
[ 32 ] 安盘.颐山诗话序[ A ].颐山诗话[ M ].清乾隆《四库全书》本.  
[ 33 ] 郭绍虞.宋诗话考·六一诗话·卷上[ M ].北京 :中华书局排印本 ,1979.  
[ 34 ] 张玉书,王鸿绪,张廷玉,等.明史·文苑传·林鸿[ M ].北京 :中华书局 ,1974.

[ 责任编辑 徐枫 ]

On Notes on Ming Poetry and Its Formation , Development ,  
and Characteristics

ZHOU Wei-de

(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, Zhejiang University , Hangzhou 310028 , China )

**Abstract :** Mingdai shihua ( notes on Ming poetry ) was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classical poetry studies of previous dynasties . It had a positive influence ov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ng poetry as well as the formation of the classical poetry studies of the following Qing Dynasty . Mingdai shihua , which was in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Zhongguo shihua ( notes on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) , has maintain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Zhongguo Shihua . The development of Mingdai shihua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: the early stage , the middle stage and the late stage . In the early stage , Mingdai shihua focused on the “ talk ” of the shihua . The middle stage saw the advocacy of the doctrine of “ back to the ancient style ” . In the late stage , however , it became the studies in which the said doctrine was criticized and entirely rejected , while individual style and freedom were encouraged . Consequently , based on the poetry studies of the previous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, Ming scholars turned the comprehensive studies of Songdai shihua ( notes on Song poetry ) into the special studies . Furthermore , they developed the systematic poetics by carrying forward and enhancing the poetry composing methods and theory of the Yuan . The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ingdai shihua find expression in such aspects as the reflection of Ming features , clear purpose , theoretical approach , systematic approach and specialized studies .

**Key words :** notes on Ming poetry ; notes on classical poetry of previous dynasties ; formation ; development ;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